

乡镇行政的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叶 贵 仁

[摘 要] 乡镇在我国发挥着“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特殊作用,以往研究忽视了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作用的发挥。以广东一个乡镇个案为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乡镇行政的逻辑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是其中的五个核心概念,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支持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

[关键词] 乡镇行政;乡镇领导人;个案研究;理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3-0358-07

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深入,乡镇“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独特角色使之成为行政运转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一方面,乡镇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承担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和责任,法律、法规对乡镇责任的规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乡镇所要承担的工作主要包括政治与公共安全、经济与财政、精神文明建设、公共事业、村(居)工作等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无法调动资源履行如此多的责任,乡镇行政能力部分地处于弱化状态,表现为:一是乡镇政府无法提供服务,无法满足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科技、文化、制度支持;二是乡镇债务增多,正常的行政运转困难;三是干群关系紧张,农民上访等矛盾突出^[1](第 5 页)。乡镇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引起了人们长时间的热烈关注,但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目前的研究现状仍不令人满意。需要关注的是,学者们对乡镇问题的研究是从哪些路径展开的,为什么已有的研究方法不合适?笔者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来弥补目前研究的不足,进而得出乡镇行政的逻辑。

一、文献综述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认为,国家具有能动的改造、影响社会的力量,国家和社会是一种互动关系,不应该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2](第 50-53 页)。由于乡镇恰恰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结点上,国家科层力量不断地进入乡镇之中;同时,以广大村(居)为代表的社会利益亦输入了乡镇,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资源整合都能从乡镇行政过程中得到体现;对这两股力量的分析是本文无法回避的,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乡镇行政的分析路径。

许慧文(Shue)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的标志性人物,她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是一种“蜂窝状”结构。虽然国家将其权力中心扩大、下沉到了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的分散和孤立状态,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甚至加强了”。在这种“蜂窝状”乡村社会结构中,农村干部开始作为村庄利益的保护者,他们敢于同乡镇领导讨价还价,并且阻止和漠视上级的命令,这种“农村地方主义模式”阻碍了乡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步伐^[3](第 125-152 页)。改革并没有带来以乡镇为代表的国家权力从乡土社会后撤,反而促进了

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延伸。另一方面,许慧文认为,早在集体化经济时期,农村社会和乡镇之间就存在讨价还价的关系,这也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一趋势在日益强调地方利益的现代社会中更加明显。乡镇领导人必须同时面对国家政权建设所产生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同时又要充分利用民间社会网络的力量,他们扮演了一种国家与社会之间“中间人”的角色。

简·奥伊(Jean C.Oi)主要关注国家或社会的自主性、相对强度,她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互动的,但两者的利益是有区别的,村庄处于两者的结合点上。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是以生产小队长(即后来的村民小组长)为媒介的。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庇护主义政治”,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是虚弱的,乡镇干部一方面执行上级的政策,一方面维护地方的利益,而农民被庇护主义政治结构整合进国家政治中,他们以个体、非正式的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通过庇护主义关系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4](第63-67页)。

黄宗智(Phillip C. C. Huang)认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不是二元对立的,但也不存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他采取了一种三分的观念,即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第三领域”(third realm),国家与社会是一种协商合作的关系。在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权建设所推动的科层结构下沉到了公社(乡、镇),党支部建到了大队(村)一级,并且逐步出现了乡村集体经济这一新型第三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领域经历了社会化和“去国家化”。乡村集体经济的领导人“成了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一种关键地带”,而具有“协商性”非命令性的新型权力关系也发源于此^[5](第260-282页)。

以上学者的观点对于理解处于“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乡镇行政具有启发意义,问题在于,如何通过微观的乡镇运行来体现国家意志的贯彻呢?而以往的研究往往过于笼统,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对乡镇领导人的自主性缺乏关注,很少有人把乡镇行政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联系起来,忽视了个人角色对行政过程的能动作用。虽然说自上而下的科层体制决定了乡镇行政的固有程序,但乡镇领导人的个人选择对于明确把握国家与社会互动行为的边界发挥着能动的作用。其次,对乡镇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亦缺乏细致观察,忽略了经济动力及社会网络的力量,无法解释乡镇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很多研究仅依据西方的相关概念便做出了应然的判断,缺乏微观的经验支撑,缺乏对乡镇权力结构及其运转的深入描述和分析。再次,这些研究忽略了乡镇行政过程是一个多元的有机体,没有从具体乡镇运行的个案研究中来寻找中国乡镇千差万别的实践逻辑,研究者没有深入到权力与责任的视角来理解乡镇行政,且对于乡镇税费改革之后的新格局缺乏关注。笔者尝试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在前人成果的启发下,通过对个案乡镇的细致考察来弥补原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方法

本文把乡镇作为自主性的组织来考察,认为不能仅仅关注自上而下的各项乡镇机构改革的宏大叙事,也不能仅关注农村建设,而是要强调乡镇自身行为的逻辑。乡镇治理体系有其特殊性,只有在广泛考察乡镇一般性权力运作的基础上进行个案研究,才能从具体微观的层面拓展原有的研究。从个案乡镇场域出发,通过增加对外在影响因素(比如社会制度、文化、社会网络)的考察来强调乡镇行政的独特性。将乡镇看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空坐落,通过对它的权责结构及行政过程的分析,重点关注乡镇领导人是如何通过个人作用的发挥来实现“上连国家,下接村居”。因为乡镇承担的事权普遍大于其所拥有的财权,乡镇领导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完成其所承担的责任,所以乡镇行政的出发点便是如何扩充其财力,达到经济收益最大化,从乡镇领导人讲话、会议、年度计划、日常工作安排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同时他们又在争取受损最小化,这从乡镇企业改制、同上级的“讨价还价”、对村居的科层化管理都可以得到体现。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缓解了体制内的固有压力,使得他们能够调动更多的体制外资源来实现个人的价值追求。总之,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行为使其能够尽力完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的各项任务,并实行经济收益最大化。

T镇是地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关镇(2005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140.89亿元人

民币),即 A 市政府(县级,以下所提到的 A 市都做此理解,不再重复说明)所在地,城乡结合的特点决定了 T 镇的机构设置和行政过程都是相当复杂的。对 T 镇的研究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透视乡镇行政逻辑的微观交叉点。通过深入的剖析,可以循序渐进地刻画出乡镇运转规律,并解释本文的核心问题。个案式考察也有助于寻找一般意义上的乡镇行政逻辑,发生在 T 镇的日常事件同样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众多的乡镇(街道)一级,因此,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推广性。

个案研究的方法强调对研究对象的细腻描述和深刻分析。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文献分析等方式收集数据,可以从微观、细致的角度来挖掘乡镇行政过程的特殊性,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才有可能进行一定的创新。对具体个案的研究不会把自己封闭起来,通过侧重于研究具体问题,回答具体问题,才能清楚地认识具体问题。还需要考察乡镇政府组织与乡镇领导个体的不同,前者是由有着不同利益的个人或群体组成的,乡镇行政过程中不同人的利益、目标和观念是有区别的;而乡镇领导人处于协调不同利益,并且在有限范围内争取利益最大化的地位。尽管在经验层面上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泛泛研究多,具体研究少,以深度描述为切入口来研究乡镇行政逻辑的更少。因为涉及非常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问题,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开放的学术心态,能够对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 and 研究成果保持敏感。

笔者对 T 镇的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中展开的,无法人为改变研究环境,且在 T 镇行政环境中观察了两个月(2006 年 6、7 月),通过访谈、参与式观察、历史文献整理等方式收集了大量数据:第一,采用开放式访谈,形式上不拘一格、因人而异,为被访者的表达留有余地,对访谈者叙事的关注使研究者能够进入研究对象和所在行政环境的交换面;第二,参与式观察可以获得对具体事件的深入体会,这样处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官方身份限制,访谈对象一般有意地垄断信息,或者把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访谈者,这就需要研究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来辨明真相;第三,对乡镇的文字数据、镇志、档案材料、会议记录、党政办公室的日常会议资料、乡镇大事记、各种各样的责任状、综合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的考察往往能够印证被访谈者谈话内容的真实与否,也有助于从乡镇纵向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问题。通过以上三种方法,力求从微观、细致的角度来挖掘乡镇行政逻辑的特殊性,因为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才有可能发现问题。

三、乡镇行政的核心概念

通过个案考察,发现 T 镇行政的逻辑体现在:通过行政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来增大乡镇财力,这是乡镇行政中经济任务、权力与机构设置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行为的具体体现。镇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增强财政实力,拓宽从事公共事务的经济基础;如果说工业收益最大化、农业收益最大化是乡镇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话,社会网络资源则起到了外在的保障作用;资源优化与整合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有限的资源,理顺相应的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机制。这些措施部分地缓解了体制性压力,同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镇领导人理性选择的落脚点便是最大限度地化解乡镇财权小、事权大的矛盾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完成上级的相应任务。下面将结合具体内容,对本文的五个概念进行阐述,希望能够从中得出更为具体、微观的乡镇行政的逻辑。

1. 压力型体制:这一概念是对“科层制”的进一步细致化,也是乡镇行政的外在环境。随着现代国家公务事务的日益增多,为了便于自上而下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乡镇被全方位地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上来,它在职权和机构设置上同上级政府保持了高度一致性。由于权力资源是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且乡镇处于科层制的末端,它所掌握的信息、资源、财力都是最少的,不足以完成上级政府交代的各项支出责任。与之相对应,乡镇领导人承担的责任便是执行性、管理性的,这是压力型体制的必然结果。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县(市)级政府对乡镇的激励和监督是以行政压力为导向的,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上级政府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给乡镇领导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级仅关心任务和指标的完成情况,而不管乡镇能否完成、采用何种手段达到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便是“一票否决制”(即一旦某项任务不达标,就视全年工作成绩为零,不得给予各种先进称号和

奖励)^[6] (第28页)。“一票否决”具有强制性与单向性,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汛、教育和民政等事项(每年都有变化),将乡镇领导人的荣辱、政绩、升迁与之结合起来。问题在于,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票否决”的合法性来源在哪里,压力型体制的适用边界也被人为扩大了。

2. 经济收益最大化:压力型体制以强大的力量约束着乡镇行政的运转,而经济收益最大化则是镇领导人理性选择行为的直接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T镇工业总公司及其下属的各个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这些风光一时的集体企业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制后,通过工业园建设追求规模经济、通过招商引资注入资金和技术成为T镇领导人发展经济的新思维。同时,这些企业的利润又被T镇领导人源源不断地用来从事扩大再生产和公益事业,镇领导人推动的“三帮一”制度也旨在推动农民的收益最大化,从而获得村庄的广泛支持。从这个角度而言,经济与财政动力同T镇领导人权力的行使有着内在的联系,当经济增长的速度作为镇领导人的考核指标时,很难避免他们干涉企业经营。即使在今天,T镇两个总公司所辖的T镇住宅公司、T镇建筑公司的人事安排仍然是由镇领导决定的,且房地产开发所需的土地也来自镇领导早年的储备。面对财权小、事权大的难题,镇领导人的首要选择便是通过工业经济的发展带动镇域经济总量的大幅度提升,并通过招商引资、加快生产要素流通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传统观点认为乡镇领导人从事经济活动仅仅是为了谋利,并过度地干涉了企业的行为。从调研情况来看,这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单纯依靠市场行为很难开展统一的规划,工业园建设中的征地就离不开镇领导人的积极作为。作为自主性的理性行动者,镇领导人通过收益最大化追求公共利益,他们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容忽视的,而他们的行为又关乎乡镇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

3. 社会网络:包括了传统的文化网络与T镇特色的侨乡社会网络(199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T镇的华侨华人遍布世界38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达到219445人,超过了2006年的T镇户籍人口),它辅助于经济收益最大化,乃是社会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体现。社会网络不同于科层体制的法定影响力,它内化于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中,且部分地取代了正式的政府职能,这也预示着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从传统文化网络的角度而言:萧功秦认为中国20多年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便是“与传统的非断裂性”,即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它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乡镇的现代化过程而自动消失,仍然以潜规则的形式存在于其中。仅从压力型体制来理解乡镇运行会割断与历史的联系,往往会忽略正式制度背后的“文化约束”,即“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信念与传统”^[7] (第15页)。但是,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也注入了人们的思考习惯,它使得人们抵制先进的管理文化,从而难以提高行政效率。当上级追究镇领导人的责任时,熟人社会中的文化网络则提供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第二,侨乡这一独特的社会网络资源是T镇区别于A市之外更广泛的普通乡镇的特色所在,它发挥了非体制性的资源动员作用。大量的华侨捐款提供了充足的乡镇公共物品,减轻了领导人的财政压力。从更深层次而言,侨乡社会网络亦可以通过“搭桥引线”把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思想引入T镇,又可以推进行政效率的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由于T镇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多于本地人口,这种基于亲情、外出谋生的社会网络带动了本地人口的大量移民海外,出现了地方发展中人才匮乏的被动局面。甚至T镇政府的公务人员,都经常有人移民海外,这也使得T镇领导人面临的形势异常复杂。社会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利用侨乡这个巨大的无形资产,同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密切相关。

4. 资源优化与整合:以上三个因素从不同层面影响了乡镇的变革步伐和程度,资源优化与整合则是对压力型体制的主动调整,更离不开镇领导人的主动争取。从2001年开始,原T镇和F镇的合并促进了“强强联合”,新T镇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也使得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成为可能。T镇具有典型的城乡结合特色,“村改居”使得它能够区别城乡、分类管理,同时也有利于调动村、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村、居并存的现象也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和体制内摩擦,这也为后来“镇改街道”办事处的推进埋下了伏笔。因为街道办事处不需要同市里对口设置机构,相应的利益冲突也将变少,T镇同A市所属的若干

职能部门也能够“平起平坐”。街道办事处将主要承担城管、民政、民事调解、失业救济等工作,预算收入和支出责任将更为匹配,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矛盾也会得到改善。虽然镇领导人的权力和责任相应缩小了,但是激励机制将更为明确,原有职能也将被重新界定。进一步来讲,近年来自上而下的乡镇机构改革也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改革的举措可以说是不拘一格,但存在前后矛盾性。研究者应该从历史演进上展示发生在乡镇的故事,如果割裂历史的脉络,不关注昨天的故事便不知道今天来自哪里,亦不知明天将向何处去。

5. 领导人权力与责任: 乡镇行政过程受到以上四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乡镇领导人则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通过正确的行使权力发挥了“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作用。压力型体制的支配性使得 T 镇领导人向上负责的倾向更为明显, 但是, 乡镇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 且广大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2006 年 T 镇设 10 个居委会、26 个村委会)为它提供了一定的政策缓冲的空间, 只有维护自身利益及村、居民利益才能获得自下而上的合法性认同。从上下级的讨价还价、农(居)民利益的表达、地方经济发展中都可以看到 T 镇领导人对上级政策的灵活变通, 其中也孕育了向下负责的发展趋势。T 镇领导人处于一种多重的负责状态之中, 他们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 离开权力单纯谈论责任不益于从深层次理解乡镇行政的逻辑。乡镇领导人的权力与责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笔者反对离开权力空谈责任, 因此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是本文的第五个核心概念。它和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共同体现了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从图 1 可知, 它们对应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乡镇行政目标, 共同组成了完整的乡镇行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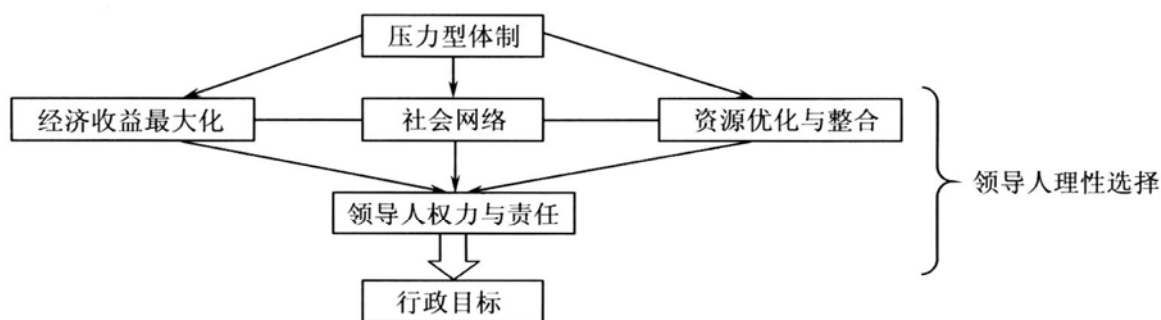


图 1 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五个核心概念组成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需要指出的是,这只能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时空点上解释 T 镇行政过程。由于乡镇运转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且不时地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研究者无法穷尽这些影响因素;即使本文所提的五个核心概念,也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仍然难以排除一些不可预测因素的进入。

笔者注意到用“压力型体制”更为恰当地指代了科层制度的核心特点,它也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压力型体制是乡镇领导人财权小、事权大的制度性根源,它的缓解将有助于乡镇领导人权力和责任的相符(预算收支结构亦包含在内)。但是,乡镇领导人对上级政策的灵活变通、对政绩工程的追求一样会造成他们扩大权力、推卸责任。

结合前文的论证过程及图 1 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笔者发现,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行为体现在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之中,并最终影响到他们的权力与责任格局。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也是一个“宏观—微观”的转化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领导人主动地缓解了外在的体制性压力,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

四、结 语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从较为微观的层面上描述乡镇行政过程,笔者发现,乡镇领导人并非采用单一

模式来管理村委会、居委会、工会和企业等不同类型的组织,也并非采用固有模式来应对上级布置的各项公共事务,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性选择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对于解释乡镇行政过程提供了一个微观的切入点,乡镇诸多的决策、规划、改革都同领导人的选择与权衡分不开,他们并非“简单地”执行上级决策。在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机构改革与人事变动的背后都存在乡镇领导人的理性选择行为,笔者所了解的T镇招商办的设置、对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管理、镇领导人的调整便是例证。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下的“强国家”同代表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利益的“强社会”在乡镇相遇,两者的积极互动与配合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理论大师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对理性选择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发展了新的社会行动理论。它运用个体方法论,采用目的论的原则,在低于社会组织行动水平的层次上解释个人的行动,认为个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社会系统的行为间接地来源于个人行动;个人行动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有目的的行动,可以用合理性来说明它,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8](第18页)。法人行动者追求有目的的行动,乡镇领导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把乡镇范围内的资源和利益进行集中,通过合理的配置寻求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不能仅强调科层制对个人的规制作用,个体对制度的选择也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

理性选择理论来源于经济学的三大假设,即利益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稳定的偏好。理性行动者的基础是“合理性”(它是“存在于个体内部的一种思维与判断的结果”),这一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中,这也符合本研究的特色。理性行动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得效益,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可以提高理论的预测力,“以数量的最大限度增加或减少的方式比不做解释更有预测力”;这一原则也有利于实现个人行动微观水平上的简捷,从而保持理论的简约^[8](第18-21页)。

按照科尔曼的观点,可以把乡镇行政的理论解释框架描述如图2:D表示的是传统的解释逻辑,即从压力型体制的运行中推论出乡镇行政目标,显然这一解释忽略了乡镇领导的个人行为。在图2中,A表示从宏观的乡镇行政具体到个体领导人的权力行使,这便是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B表示领导人通过行使权力实现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是个体有目的的活动,它体现为乡镇领导人的经济收益最大化、利用社会网络和对资源的优化与整合;C表示领导人责任的履行推动了行政目标的实现,这便是从微观到宏观的转换。B部分正好反映了科尔曼所说的“系统行为由低于系统水平的系统组成部分,即个人或行动单位综合而成”^[8](第3页),这也是本文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乡镇行政的关键点。该理论“通过研究个人的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实现微观—宏观的连接”^[9](第121页)。通过对乡镇行政的关注可以把乡镇领导人的行为同压力型体制、行政目标建立联系,但是,制度只能影响到个体,而不能决定他们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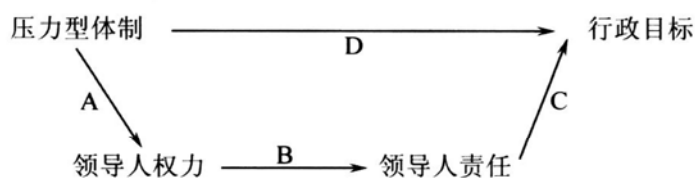


图2 理性选择理论视野下的乡镇行政

通过个案考察,笔者并不支持广为学者所推崇的实现乡镇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且这一转变也不是学者们提一些口号就能实现的。进一步的改革方案需要把源自于个案研究的结论逐步地推而广之,同时需要长期的跟踪研究以及持续的田野调研。

本文选择了个案研究的方法,希望通过对T镇的个案研究来找到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乡镇的“真实记录”,这也表明笔者关注现实,并希望这一研究引起决策者的重视。本文特色是把微观现实同宏观叙事相结合,通过对本土资源的挖掘做到用事实说话,并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构建一个乡镇行政的解释性框架,当然,它的有效性仍需进一步检验。通过个案研究可以寻找到一些带有典型性的乡镇特征(关于某一类现象的普遍性特征),通过对这些集中性问题的剖析可以有选择地把结论推广到类

似乡镇。这一点在笔者 2004—2008 年对广州市数个街道办事处、东莞市 S 镇、磁县 H 镇的调研中得到了证明,个案研究的抱负也在于通过典型性寻找共性。

[参 考 文 献]

- [1] 李昌平、董磊明:《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2] [美] 许惠文:《美国政治学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三种方法》,载《国外社会学》1995 年第 3 期。
- [3] Shue, Vivienne. 1988.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美] 简·奥伊:《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载《国外社会学》1996 年第 5-6 期。
- [5] [美]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 [6]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 [7] 萧功秦:《中国转型体制的类型学》,载《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6 年 8 月号。
- [8] [美]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基础》上册,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 [9] 丘海雄、张应祥:《理性选择理论述评》,载《中山大学学报》1998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 叶娟丽)

Logic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t Town Level

Ye Guiren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China's township is playing a special role of "meeting the state, satisfying the society". 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e author found that previous research overlooked the individual leader of his role of rational choice. Based on the flaw awareness, this paper is designed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Connecte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of township with the leader's rational choice through the case study, the author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administration at town level. There are five concepts: pressurized system, maxim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networks, integrate resources and rationalize administrative system, leadership'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the logic of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t town level.

Key words: governmental administration at town level; township leaders; case study; rational choice